

存史資政
知往鑒來

辛巳年冬

任海興

存史資政
鑒往知今

任懷祥

十月廿六日

清理編緝出版庫存
史料對歷史負責對
後人負責

魏世成
二〇〇二年
冬月

积极发挥政协文史
资料存史、资政、团
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陈育宁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存稿选编之一

宁夏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编委会

顾 问 魏世成 陈育宁

主 任 傅洪备

副 主 任 李品三 沈乃录

编 委 李建新 李 艳 吴强国

特约编辑 刘继云 曾 干

编 辑 李 艳

目录

我所走过的路	曾杏绯	1
怀念我的老师胡公石先生	止 水	16
我的文学经历	吴淮生	21
回忆我的父亲姚以壮	姚乡生	33
美丽的痛苦	陈琢如	39
宁夏文联概述	吴淮生	49
著名回族书法家刘正谦先生	尹 旭	62
编导演俱佳的艺术家庄元和	李凝祥	66
秦腔名丑钟新民	井笑泉	81
维族秦腔演员马桂芬	李凝祥	96
宁夏回族秦腔女演员王志杰	于秀兰	107
宁夏银川集市贸易及商业发展概况	南秀璞	115
宁夏水稻生产概况	贺仲康	129
昔日银川市场剪影	祁志彬	133
解放前后的中宁县城市场	杨应林	140
湘川客商担枸杞	杨应林	144
抗战时期的盐池县商业	郝文和	147
盐池县第一家企业元华工厂	郝文和	156
困难时期的煤校生活	陈琢如	160

大兴碱业公司与立达碱业公司	王午生	167
忆大兴碱业公司	丁建荣口述	170
祖父郑万福轶事	郑绳祖口述	173
柏铸匠	吴少良	178
献身于新猪种培育和研究工作	王柏玲	183
民国时期的宁夏水利	卢德明 李景牧	190
解放后的宁夏水利	卢德明	198
同心与固海扬水工程	卢德明	206
崔桐选整治宁夏水利贪官污吏	卢德明	211
八十自述	张儒铭	213
黄河大柳树水利工程论争回忆	吴尚贤	225
解放前的宁夏天主教	李春达	229
天主教传入中宁	刘静山 张 崇	236
回族和平老人郭南浦	马 辰	244
回族学者张缙绪先生事略	马 辰	251
怀念张学明哈吉	努尔·文广	257
昔日宁夏回族教育	马万钧	261
致力于回族教育的儒士张逢泰	李子杰	267
马仲英占据宁夏四十天	张慎微	272
马仲英攻宁夏省城和吉鸿昌兵变	毓 运	276

我所走过的路

·曾杏绯·

1911年3月26日我生于江苏常州。这是个景色秀丽、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城市。我的家庭是个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家庭。我祖父是秀才,但没有职位,一辈子守着曾祖父传给他的房产过日子。祖父的上辈可能有过画画的人,家里设有花厅、宝画斋、可读轩等厅室。到我父辈时,家业已日渐衰败,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当科员。我母亲生我兄妹二人。哥哥曾承训解放后在银行工作。我五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再婚携继母外出自过。我和哥哥完全由祖父母抚养。

我渐渐长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也很想上学。但我祖父思想比较守旧,不许我们上新学堂,只准在家念书。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十几个孩子,加上我们兄妹二人,在我家请老师办私塾,那时我刚七岁。私塾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中庸、大学等,只读不讲,今

天老师领读,明天我们就要背诵,背不出来就要挨板子。课文意思大都不明白,读起来很乏味,每天都有人挨板子。有一次我因没背熟,想偷偷看看书,也挨了三板,以后就咬着牙死背,死记,再也没挨过打了。

这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比较激进的思想,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提倡新文化运动。许多亲友都劝我祖父让我们到新学堂去念书。上了两年私塾后我就到常州女师附设的小学班插班上初小二年级,直到初二。这时,我非常喜欢学校的图画课,我的图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许多同学的图画作业都求我来做。可是1928年我因为患童子癆(吐血)而辍学。我瘦骨嶙峋的样子,吓坏了祖父母。他们请来了算命先生为我算命,说是只能活一年,这更叫祖父母不安,对我的活动严加控制。

祖父母让我在家养病,不让我出去找同学们玩。我只能在家里寻找乐趣,好在我从小就喜欢那些千姿百态的花卉,我便成天以花木为伴,在花园里栽花种树,打枝浇水,看花画花。对着一枝枝新开的牡丹,一枝枝新梅和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一丛丛野花,我可以看上好半天,琢磨来琢磨去,我一边琢磨一边描画,这美丽的大自然不仅补偿了我幼年失去的母爱,竟还治愈了我的癆病。一年后,我的身体大有好转,祖父母看我这么爱画,在我16岁时便送我到常州有名的国画家徐凤林处学画。徐老先生长于人物画,而我酷爱花卉,一年后又拜著名的恽南田画派没骨花卉画家蒋志明为师,学画三年。

蒋老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说话不多,总是把一些画稿交给学生去临摹。他说这是基本功,你要是临摹都不像,自己还能画出什么来?光是勾画稿就勾了一年,一年只描稿子不上颜色,一直画到花与叶子都有立体感时,才学上色。第三年才让独立画画。老师给的画稿,都是些放了很多年的油竹纸,有的已破碎不堪。临摹前把画稿对齐整平就要费一番功夫。老师一摞一摞地给你,你得一张一张地描出来,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十几个学生中,有些人早就

不耐烦了，总想找机会出去休息一下。我就一个劲地画呀描呀，我性格好强，要学就要学出个样子，常常一坐就是八九个钟头。交给老师看时，心咚咚直跳。老师不说话，只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他的看法。当我看见老师对我的稿子点头时，一切辛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从老师的眼神里感到了老师对我的赞许，我便更加用功，老师的任何一点小小暗示，都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就更加迷恋花卉创作。我的驼背，就是这时候开始的，我的没骨花卉的厚实功底，也就是这样苦练打下的。后来，老师干脆将我的一些作品署上他的名字。这样，我的作品得到朋友们的称赞。结业的时候，真有点小名气了。

有一次，我父亲把我的画拿去送给他的朋友华主任。这位华主任喜出望外，赞不绝口。从此，我父亲的同事、亲友求画者甚多，应接不暇，我便终日伏案应付，祖父母怕我累着再次犯病，埋怨父亲多事。后来华主任出了个主意，他请了几位有地位的社会要人签名介绍，登报声明要收取润资。这样，一来可以挡一挡求画者，二来也可增加一点收入。后来，父亲让我好好画了几幅画交华主任送人，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邵力子、叶楚昌、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五人，他们签名在报上发了启事。不想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马福祥看了画非常赞赏，而且还让华主任带话要聘我到南京给他夫人做绘画家庭教师。我从小没离过家，没离开过祖父母，老人不放心我出去，我自己也不想做这个家庭教师。但我父亲坚持要我去，我心里很不安，惦着常州的家，惦着我那些花草树木，惦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又无法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好顺从。

1930年冬，我开始了家庭教师的生活。我每天早去晚归，干了两年，我的绘画技巧又有所提高，艺术创作体现在教课的示范作品中。开始时我很想家，也不习惯这种生活。日子久了，觉得自己学的东西都用上了，给别人讲的过程中，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心里也很高兴。

通过教画,马福祥夫人马书城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很喜欢我,便想为她的弟弟马季康做媒,把我介绍给马季康。我父亲很高兴这门亲事,我祖父母虽不同意,也拗不过我父亲。我自己从小习惯于一切听大人的安排,虽有少女的羞涩和胆怯,也不敢说什么,婚姻大事也就只能听从父亲安排了。

1932年夏天,我与马季康在南京结婚。婚后,季康给我的印象不错:他为人正直、聪明善良、知识广博、待人真诚厚道。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季康当时在扬州建设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往高淳县建设科任事务所所长。我们在高淳县住了三年多。婚后我心情很好,常常画画。小时候那种想留住春天,让花朵永不凋谢的梦想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可是,我和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要面对生活、家庭、孩子这些课题的考验。现实生活远比想像复杂得多。作为家庭主妇,我要料理家务。过去在娘家,一步也没离开过祖母,一切有祖母操心,现在得从头学起。193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更是弄得我措手不及,不可能一心一意地画画了。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一岁多时,高淳县闹灾荒,卖儿卖女的站满一条街。接连几天,我发现有个比我儿子大些的女孩老在我家门口跟我儿子玩,一问她爸爸妈妈她就哭,只说她叫冬冬,大家议论说可能是逃荒的人家丢下的,劝我领上。看着孩子可怜的小样,我的确不忍心不管,只好把她留下了。可我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已带得够苦的了,何况又增加一个。更不幸的是,我先生因怀才不遇、失业潦倒而染上了鸦片瘾,家庭生活一步步艰难起来。

1936年,我们离开高淳到南京暂住。不久,季康随朋友到广州去找工作,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常州娘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警报声不断,今天这里被炸,明天那里被烧,人们老是提心吊胆地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全家人去乡下投亲居身。我的祖父母、父亲,因受不了这种惊吓,在这一年里相继去世。

这时,我想到广州去找季康,而家里的长辈和我哥哥都觉得广州太不安定,主张我到陪都重庆去躲一躲,我的婆母、兄嫂都在那里。那年月,兵荒马乱,难民人山人海。坐船的一船一船翻到河里没人管;挤火车的常常被人从车上推下来。当时我太年轻,大家都不放心我带两个孩子长途跋涉。多难的年月,女孩子的命运更多一层苦难,经与长辈们商量,在我离开常州时,将冬冬和我的两个比冬冬还小的妹妹,许配人家做童养媳,由婆家各自带走。当时冬冬8岁。谁知这一别,我与她竟天各一方,直到解放后才得相见。

我们一路坐难民车、难民船,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不久,季康在广州工作无着也到重庆来了。一大家人只有兄嫂有点收入,生活十分艰难。无奈之中,由邻居介绍我到附近于学忠家为其女儿于允文做家庭绘画教师,略有补贴。当时作为陪都的重庆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迫于生计为人做绘画教师,心中的苦楚无法形容,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1939年5月11日,这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家的所在地重庆南岸弹子石顷刻被日机炸成一片瓦砾。我们没有了安身之处,除了身上的衣服,别无所存。我的那些画具及画稿(即使逃难我也没舍得丢掉)这次全被烧光,我的心痛上加痛。我们只能钻稻草窝过夜,幸得那位姓于的学生家的帮助,送来衣物,帮我们渡过难关。婆母和我们扶老携幼又逃往隆昌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哥哥在绵阳航政局为季康找到工作,我们又从隆昌迁往绵阳。1941年在绵阳有了第二个孩子,更增加了一层艰难。我们只能买稗子和碎米充饥,买菜根本谈不上,买一碗酱要吃一星期。现在回想起来,绵阳的几年真不知是如何渡过的。

1941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又从绵阳迁往平凉,投奔季康的弟弟马汝邻。当时汝邻在平凉任陇东师范校长,他安排季康在陇师教书,我亦在平凉女师和女中任美术教员。

在平凉,有幸认识当时画坛颇有名望的国画画家赵望云。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很是称赞,并鼓励我举办一个个人画展。我当时拖

家带口,经济拮据,办画展谈何容易,更何况那样的社会环境,一个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年轻女画家的画展,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只能在心里感谢知音的关照,苦苦地在生活中煎熬。

马书城得知我们的艰难情况以后,认为我的婚姻是她造成的,她有责任帮助我,带信要我带孩子到宁夏来住。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接受这种建议。1947年我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银川。

到银川以后,开始与马书城住在一起。但我因为家境拮据,无力应酬,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常遭人白眼,总觉得低人一头,寄人篱下的滋味使我内心痛苦不堪。为此,我毅然从马家大院搬了出来,自己独立生活,我觉得再苦再累也比寄人篱下好。我家的生活主要靠我在宁夏托儿所附设的妇女识字班代文化课维持,直到宁夏解放。

解放前夕,马书城离银时,曾劝我一起同行。但我一心向往自由,觉得再穷再困难自己过也自在些,所以拒绝了与她同行。我觉得好不容易摆脱了一种羁绊。

1949年8月,兰州已解放,银川的谣言也很多,季康毫无消息,我对革命也不了解,整日忧心忡忡地盼着季康的消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季康陪着一个陌生人,拖泥带水地来到家里。我当时又惊又喜。季康简单地告诉我说宁夏快要解放了,他是和谈代表,回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做牵线搭桥的工作。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又给我打了个简单比方:“鸡蛋碰石头,你说哪个赢?”我似有所悟。他又与那人匆匆离去。第二天中午又回来匆忙交待几句,说他马上要回兰州去,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不等我再说什么,他与那人就走了。

我怀着喜悦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盼望着。半个月后,即9月6日,季康随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和谈代表团一道回到银川,开始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当时我虽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从季康的言谈神色里,我感受到新生活即将开始,季康是在做一件大事情。

9月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入城仪式。我和银川人民一道,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紧接着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季康也戒掉了烟瘾。完成接管工作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使他得以发挥才能。我看到政府挨家挨户收缴鸦片,在东教场足足烧了两天。看到季康把戒烟的药品拿回家,看着他吃下去,我心里激动不已。十几年了,天天都盼着这一天。我当时那种喜悦心情的确无法形容。也为这个原因,这一辈子,无论何时,无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流言蜚语,我心里对党一直保存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共产党救了季康,也救了我的一家!我的一家,是从解放这天得到新生的!

1950年冬天,我被妇联选为出席第一届西北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冷的天,我带着刚三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开会。有些好心的同志觉得我的孩子太小,劝我不要去了。而我当时那种激动心情,怎能不去呢?代表们坐的是卡车,大家筑一圈人墙,把我和孩子围在中心。即使这样,孩子的尿布还是结冰了。我们在固原住一夜。招待所点的是油灯,只给一盏灯、一根灯芯,待我把孩子哄睡着,灯油早燃完了,我只好摸黑洗尿布。虽然这么困难,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义,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开会期间,大家还为孩子过百日,我从心里感激大家。

从西安回来以后,因为我原先在托儿所附设的识字班代文化课,1951年组织上派我参加教师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省妇联海涛同志把我调到省妇联工作。解放前宁夏各族人民长期受地方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妇女更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妇女解放的工作艰巨而繁重。其他年轻同志常常下乡,因为我年龄大,孩子小,常常留守机关,包揽全部机关事务,还常常举办各种训练班。

1954年,我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宁夏代表团成员,到南京等地参观时,我迫不及待地请假去常州寻找冬冬。听二婶说她顶替婆婆进了纺织厂。母女俩像是有一种心灵感应,离开时,她还是8岁的孩子,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在厂门口见面时,

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妈妈!”“冬冬!”居然是同时喊出来的。她含泪诉说了别后的种种苦难,我陪着她也一串一串地掉泪,当得知她解放后家庭幸福,生活不错,爱人待他很好时,我几十年的牵挂总算了却了。

妇联的工作是繁忙的。但繁忙中艺术的花朵也在我心里萌芽了。艺术是心灵的感应。以前苦难重重,生活不安定,我只能把对艺术的求索深深埋藏在心底。现在好了,乌云散去,我怎能不画呢?但当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人民刚刚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各种事业千头万绪,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而我不可能全力投入绘画创作,我对新生活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无论什么工作我都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做,只要领导分配给我了,我就一定要做好。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恢复了绘画创作。但因孩子小,家务重,下班回来,料理完家务,把孩子安顿睡下,已是深夜,只有这时,时间才是属于我的。我摊开画纸,调好颜色开始画画。我把我对新生活的感受、我的激动心情都融入了画中。

1953年,我的工笔花卉《紫薇凌霄》被选送参加全国第三届美展,当时宁夏这方面的人才还不多,我是宁夏第一个参加全国美展的人。接着,我的工笔花卉《牡丹》参加1955年全国美展,《芍药花》参加1956年全国美展……此后,每一届的全国美展,都有我的作品参展。

1960年,我作为宁夏美术界代表之一,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至今。

1955年,我从甘肃省银川地区妇联调地区科学普及协会工作,是为了发挥我的特长。科学普及协会有一个科普小报,让我一面做版面设计、美编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从科学普及协会调自治区文联,这进一步体现了党对我的关怀。当时,宁夏各艺术门类都还没有成立协会,在自治区文联内设有各艺术小组,我便负责美术组工作,从事全区美术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因编制紧,我还兼做财务工作,我没有怨

言,且很满足。因为与解放前比,真是天壤之别,心情是很舒畅的。

1962年,由于组织上的关心,派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这一年,我系统地读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在京学习期间,我又遇上了赵望云,有幸认识了黄胄。老朋友、新朋友一道回忆过去,畅谈未来,切磋艺术,给学习生活增加了一些生动的内容。

1958~1962年这段时间,我的艺术创作虽然是业余时间搞,但数量比以前大有增加,在本区逐步为各方面所认可。1960年《宁夏文艺》由小报改为16开杂志,第一期就用了我的《桃李枝头春意闹》做封面,当年的第6期封面又用了我的《万紫千红》。196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单幅画《牡丹花开朵朵鲜,神州生气史无前》。1964年,建国15周年全国美展,我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和《宁可傲霜枝头老,不随黄叶舞东风》两幅作品参展。接着,《宁夏文艺》又连续用了我的《月季·石榴》、《迎春》、《荷花》;星火杂志用了《菊花》;宁夏日报用了《万年犹青》等多幅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受冲击,文联被“砸烂”,单位被撤销,全体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一向虚弱,也只好勉强为之,手脚受伤的事时有发生。季康被无端打成“牛鬼蛇神”而被关进牛棚,家也因此被抄,我的画连同我保存的如赵望云、黄胄等画家的画,都被当成“封、资、修”而遭烧毁。祖国和人民又陷入苦难之中,我刚刚开始的艺术事业又一次被无情地中断。我不能画,只能在沉默中生活。我常常想到斗雪的红梅,傲霜的青松,以及我画过的各种花草,心里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和勇气。我想,党和人民不会让祖国长此下去的。花是美的象征,祖国和人民需要美、需要花。这种美丑是非的颠倒,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的。

1971年,结束干校的劳动生活,我被分配到自治区展览馆美术组工作。